

中国现代史研究大有可为

魏宏运

魏宏运，男，陕西长安人，1925年2月10日生，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史学会理事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主要著作有《史可法》、《南昌起义》、《孙中山年谱》、《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主编有《中国现代史稿》、《简明中国通史》、《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发表的论文有60余篇。

我涉足中国现代史，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开始的。那时社会上受旧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起码得研究明清以前的，认为现代史谁都知道，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我选择方向时，也曾在现代史和古代史之间徘徊犹豫过。搞了几年古代史，对南明史感兴趣，还写了一些文章。但相比之下，中国现代史对我的吸引

力更大，感到这一领域非常辽阔，只要辛勤耕耘，就可丰收。历史研究总是要看得远一些，深一些，不能停留在现象和表面上。我阅读各种史书，尽可能多的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上了马列主义夜校。虽以现代史为方向，但并不把知识局限于现代史领域。郑天挺、雷海宗两先生还特别给我和其他两位年青伙伴补了古代史课，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研究现代史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是建立在丰厚的资料基础上的。不掌握史料，就是无米之炊。图书馆、档案馆和书店是汲取养料的场所。50年代初，旧书摊特别多，北京东安市场、琉璃厂、天津劝业场楼上，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北京东安市场，我还为学校买到一整套海关册、北洋政府公报和解放前出版的有关现代史的书刊，我读书的兴趣就更加浓厚。知识来自不断的学习，从图书资料和典籍文献中探求，效法前辈史学家优良学风，耳濡目染，逐渐地也懂得了如何收集资料，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思辨和探索问题。

今日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报刊、各种政府公报和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是最能反映当时现实的。像《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等历史悠久的报刊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尽管其报道不是自觉的，观点也不一定恰当，但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思潮和趋势及其产生的背景，可以发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事实。凡历史研究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如军事、政治、农业、工业、科学、文艺、生产技术、宗教、人口以及风俗习惯等，都有记载。旧中国人民的辛酸苦难，民族的屈辱，革命的曲折，都会映入眼帘。在我的生活中，我把大部分时间和乐趣放在翻阅旧的报刊上。50年代翻阅天津人民图书馆藏的京津泰晤士报是我星期日最大的享受。

开始进入史料世界，脑海里是模糊不清的，接触多了，将各

种史料贯穿起来，精心构思，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就有了清晰的轮廓。

我写文章，喜欢查阅报刊，如撰写关于孙中山的一些文章，关于五四时期周恩来的一些文章，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关于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关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文章，都从报刊中吸取了养料。举例来说，在天津读了《益世报》和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在北京读了《新闻报》在武汉读了《民国日报》这些报纸的有关记载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对 1927 年武汉政府的一些看法，从中了解到那时的社会变迁，阶级关系的演变，政府政策上的失误，以及活跃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人物的表现。对历史变迁中各种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逐步思考深入，很自然地，就把经过思考的东西执笔记录下来。我撰写的北伐时期工农大军在解放两湖和江西战争中的作用、汉浔英租界的收回、北伐时两湖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 年南昌武汉之争的实质、1927 年武汉政府的北伐、1927 年蒋介石集团对武汉政府的颠覆活动、1927 年武汉革命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1927 年武汉革命政府是怎样走向反动的、1927 年武汉政府为什么不去镇压蒋介石的叛变等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各种报刊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不同的倾向，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引用报刊资料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和判断能力，不能以稀为贵。

如果有可能，条件允许的话，还应该去发掘公报、书信和日记中的材料，这可以增加所论证问题的说服力。我所写的《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一文，主要根据周恩来给其表兄式周两封信和觉悟社成员之间的信，没有这些信件是无法下笔的。衡量研究水平深度之一，是作者是否使用了独特的史料和可靠的事实。对研究者来说，发现材料是一件大事。材料是客观存在的，但发掘出来，加以新的解释，则另须一番功夫，使论述有活力。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并不是向社会提供一大堆无头无绪的史

料。当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应进行分析和比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判断出原始资料的代表性与可靠性，决不可以纯客观地照搬出来。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交织在一起的事物，那么，史料所反映的内容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审视史料时，要精细的考察，周详的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史比古代史更复杂，仅就政治势力来看，就相当的多，每一势力都有自己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地方实力派的，都应翻阅，其中必然有不确切的，使用时就需要排除出去。即使是档案资料，也不能无批判地看待，同样要用求实态度去处理。

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献。遇到无文字史料可据时，就应把已证明是可靠的有价值的口头资料记录下来，以弥补史料的不足，这也是历史赋予现代史研究者的独特使命和有利条件。

口头历史的收集，有助于对研究的问题作出有历史深度的开掘。它所以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没有时间去写历史。当然也有许多回忆录出版，但这毕竟是有限的，此其一。第二，旧中国岁月多半处于战争状态，兵荒马乱，许多资料毁于战争。第三，在残酷的战争中，很多事实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第四，人为销毁文字资料，也不在少数。如国民党军队占领根据地，毁了一些；日本投降时，伪满洲国国务长官武部三藏下令销毁日本侵华的许多罪证，集中在承德的资料，烧了两天两夜，在大连焚毁的则更多。

这些年来，我的兴趣集中于抗日根据地和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研究上。我和我的同事走出大城市，走出自己的书斋，到社会上去寻找知识，利用口头历史，积累了大量资料。抗日战争年代逝去还不算太久，经历过那轰轰烈烈时代的人，现在还大有人在，他们的口述，给我们留下了生动而真实的历史。把没有记

载过的东西，载入史册，或者使沉睡的史料重见天日，这是丰富祖国文化遗产的事业。当然口述历史的质量不等，有的显得支离破碎，甚至因记忆模糊，枝节上有出入，因此必须多方核对，加工整理，使其确凿无误。

在财政部科研所组织领导下，我曾主编过两部大型资料。一部是《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为此，我们曾走访过原晋察冀边区许多地方，访问了当年创造边区的许多人，收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许多刊物如《调查研究》、《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边政导报》和《冀热边政报》等，在大学的图书馆是找不到的。我们收集的军工资料，更是难能可贵。那全部是从来没有文字记载的，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是绝密的。我们访问了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部长刘再三和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干部与工人，才弄清楚军事工业的发展状况，记录下来他们的业绩。商业贸易资料，也不容易发现，也是口头历史帮了忙。我们访问山西忻县时，很庆幸的遇见该地区财政局局长韩成贵，他原在晋察冀从事商业贸易工作，对当时的商情、隐蔽的商号以及秘密的贸易路线了如指掌，这就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和提供了线索。而我们这位抗日时的勇士在提供资料时，总是诚恳淳朴的笑笑，在他个人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发现，我们解开了根据地商业的奥秘，从而商业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另一部大型资料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两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我们除日常进行资料的收集外，还大队人马专程走访了邯郸、武安、涉县、黎城、左权，武乡、沁县、沁源等地，足迹踏遍这一广大根据地区域。资料的收集，从地方档案馆、陈列馆直至个人手中，凡是能够找的地方都找了，共收集到2000多万字。涉县文管所拥有的资料尤为丰富，《边区政报》、《边府通讯》、《太行工业》在这里可以

找到大部分。左权县保存有大量农村调查资料；沁源陈列馆则展有太岳区出版的报刊。每到一地，总有各种座谈会和单独访问活动，对根据地时期的政策、社会状况、人民生活、集市贸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一一询问，直到搞清楚为止。调查的范围逐日扩大，研究的兴趣也就日益浓厚。实地调查访问，使我们更感到这一作法是现代史研究者必修的一门课程，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

调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极重要的。我因主编这两部大型资料和撰写这方面的书，参加过不少当年革命领导者的有关座谈会。例如 1984 年戎子和在太原召集的会议，邀请前晋冀鲁豫边区局长、行长、处长、专员等共同回忆并总结抗战时期该地区财经工作的得失与发展。在这次会议中，我获得了不少当时农业、工业、商业、进出口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对当时的政策思想，我从下面的一件事也得到启发。1941 年太行区的公粮重了一点，农民叫苦，影响所及，黎城县秋粮征收时曾发生过一次离封道暴乱投敌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借口公粮重，负担不起。这是一件大事，很复杂，故我矛盾搅在一起。据当时担任边区副主席的戎子和讲，对离封道采取了镇压方针，但也接受了这一教训，从 1942 年起，就着手减轻人民的负担。

许多事实告诉我，搞现代史的人得置身于现代史的回忆和一些不断的总结中，这比仅仅阅读几本书要深刻得多。不能认为读了几本现代史的书，就是懂了现代史。学海无涯，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广泛的一般性知识，还要熟悉各个领域的一般知识。调查研究是扩大知识面的好方法，并且使人具有开拓性，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有些问题，不通过调查，不看实际的例证，就不能了解。我们是在华北农村调查中，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的。翻阅档案、报纸、县志和家谱等资料，倾听各方面人士的口述，才弄清了一个一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农村政权的演变、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工商业的状况、集市贸易、人口变动、家族制度

和乡土文化等，一个一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对一个地区的历史，或一个村庄的历史，就有了概括的记录。通过这样典型的调查，可以领会人类文明是怎样发展的，同样也能够理解民族的凝聚力为什么那样强而有力。

举例来说，对冀东滦南一个家族的调查，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问题。该地区王官寨是明朝初年王文进由安徽宣城县豪泊村迁来定居而逐渐形成的村落。王姓一代又一代的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着生活着，成了一个大家族。尽管到 1936 年已 17 代了，但对其始迁祖仍怀念不忘，始迁祖的坟墓也最大。王姓家族有着一种牢固的向心力，一家有事，街坊邻居就来帮忙。抗日战争后，家族影响力逐渐衰落。以姓为村，这是北方村落的普遍现象，与王官寨相邻的张各庄、霍各庄、汪庄、周庄、刘庄等，都是以姓为村，“各”字即古音的家字。原来这一地区比较荒凉，人口稀少，经过数百年的人口繁衍，生产发展，才形成今天这个样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历经天灾人祸，痛苦与磨难，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每一姓对自己的门第都感到自豪。

我们曾在顺义县调查了沙井村 50 年来物质文明的变化，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切都在变，有时缓慢，有时急进。与以往的历史相比，变化可不小。以前全村除一两家是砖瓦房外，其余全是土坯草房，而现在已找不到草房了，尽是砖瓦平房，或楼房，建筑得很漂亮，窗户是玻璃的，屋内地面是洋灰的，床也代替了炕。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不再织布缝衣做鞋制袜，日常生活用品都到市场上去买。从 60 年代开始，电灯代替了煤油灯，几千年来所使用的磨子与碾子也成为历史遗迹，沉重的木犁为拖拉机所取代，水井被填平了，家家都在用自来水。全村共有 400 多亩地，只由 7 个人来承包，耕作是机械化。这样的村庄占中国农村的百分比是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已迈出了前进的步伐，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

响应该说是深远的。

研究现代史的一个难题是，客观事物一时还不稳定，不好评判。这是实际状况。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认识客观世界，历史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也只能达到什么程度。而历史现象又极其复杂，常有迷雾。但今日的研究，总是可以提供一些比较翔实和具体材料的，也可以为后来人的研究铺平道路。历史是一条永无尽头的长河，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其总体的一些不同侧面将依次显示给一代又一代人，研究者则把到那时为止所发现出来而以前未曾发现的珍贵东西以及错综复杂的现象所掩盖起来的内容揭示出来，探究其内在联系，或梳理支脉，洞幽见微，使历史不断给人以理论启示。

对历史上进步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东西，都要研究，使后人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借鉴。现代史研究对当代的借鉴作用更为直接。历史是可以给人以智慧的。

现代世界各国来往非常密切，任何一国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文化的交流、影响和渗透，很是突出。我们的研究，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考察，放在整个人类奔流不息的文明长河中去考察，并且应该吸收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不少资料在国外而不在国内，外国学者的著作有不少论述对我们有一定启发，可以用以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外国列强侵华的资料，要到国外去找。

研究现代史不能保持纯客观的态度，总要爱憎分明，歌颂进步的，批判保守的和反动的，发挥历史学科的战斗作用。当然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让历史事实说话。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应遵守的准则。随意杜撰，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后人总是要将其从历史资料中割除出去。

历史研究不能象哲学家那样依靠推论和思辨，也不能象文学家那样依靠灵感、想象和虚构，而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世界中摸

索前进，将所得的史料经过筛选，上升到理论，成为有条理的思想。当问题在自己头脑中形成，已经具体化了时，还应将所要研究的问题仔细思考一番，看自己的论述是否合乎情理，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任何思想的最初草图，总是有缺陷的，在头脑中多萦回几次，想得细微一些，周到一些，就可以避免少出现差错。近年来在探讨 30 年代初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和不抵抗政策时，一些论述就不符合逻辑。蒋介石这一政策的恶果，已为历史所证明，对这种政策加以肯定，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而且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难道强盗入侵，就任其入侵，仍要集中全力进行内战，造成民族的悲剧吗？这也是蒋介石的光辉思想吗？这种错误观点所找的论据是，中国太弱，无法抵抗日本的暴力，只要安内攘外，卧薪尝胆，等待国内平静了，力量充实了，再来抗战。这只不过是把蒋介石的话又重复一遍罢了，不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是要结合历史实际考察其究竟，说没有力量抗日是不能成立的。当时东北边防军有 17.9 万多，沈阳兵工厂有步枪 8 万枝、机关枪 0.4 万架，还有 263 架飞机。南京政府正组织 30 万军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直接指挥围攻江西红军，力量可不小。以这些力量已足以对付日军。还可以马占山孤军作战，以一师之众血战嫩江桥重创日军来说明不是兵力问题。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不是也使日军坐卧不安而胆寒吗？至于说等将来力量充实了再抗日，这更是纸上谈兵。日本怎能允许中国积蓄力量呢？即使中国能增加一点力量，日本因占有中国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其力量不是增加得更迅速吗？这是普通常识。如果我们把不抵抗政策和安内攘外政策当作宝贝遗产继承下来，那么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历史研究应峻峻清醒地审视历史，振奋民族意识和精神，不应为应承担罪责者开脱罪责，应以批判的态度，作出公正的判断，作出有历史深度的回答。

人都是在用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写历史，在历史研究领

域中，施展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否正确，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谁也不能超出自己所处的时代给予自己的限制，但可以用新思想新史料不断补充和丰富自己的世界观，否则就要固步自封。

历史研究领域是一辽阔的天地，在这里探索，大有可为。我们应站在今天的时代，用现代的思想 and 认识，对过去的历史给以批判的总结，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轨迹，使现代史研究呈现出更繁荣的局面。

生死书丛老蠹鱼

——我写掌故文字的经验谈

庄 练

苏同炳（笔名庄练），浙江省杭州市人，1925年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审退休。抗战时毕业于战区高中，因家贫战乱，未能继续升学。抗战胜利后投考空军为文职人员，1949年随军赴台。其后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利用公余读书进修。曾先后以雍叔、庄练等笔名在各报刊撰写掌故文字，偶亦有学术性论文发表。已结集成书者，计有《台湾今古谈》、《台湾史研究集》、《明代驿递制度》、《明史偶笔》、《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明清史事丛谈》、《谈史论古》、《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中国古代名女人》、《故事·历史与传说》等书，其中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曾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一)

生来不曾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亦从未抱持伟大的理想，只因性之所近，喜欢在故纸堆中搜讨故实，又因生活所迫而写了不少谈掌故的文章赚取稿费，想不到竟蒙大陆史学界的某些朋友错爱，谬奖为在“史学通俗化”的工作上不无贡献，实在惭汗之至。肖黎先生要我把写作经验提出来作一报告，不敢不黽勉从命。只是我的学术水平实在太低，写作技巧也拙劣之至，希望读者诸君不要寄以太大的希望，幸甚幸甚。

我开始从事写作的时间甚迟，动机则纯因生活所迫而必须写文章赚稿费，所谓“著书多为稻粱谋”者，是也。然而亦就是这一份文字因缘，使我这个不学无术之人居然亦能附庸风雅，在学术文化的殿堂里悠游了几十年之久，说起来又何其幸运之至！

我只是一个高中生，虽然很想上大学，却因环境不许而未能遂愿。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浙西前线一个小县政府里作小公务员，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杭州，考入空军官校做文职人员，位卑禄微，生计十分艰难。1949年官校迁来台湾。以后一段时间的物质生活更是艰困万状。难得的是，官校图书馆有很多文史哲类的书。我对文史类的野史杂著及掌故笔记等书极有兴趣，穷无聊赖之时的精神生活，只有以读书为消遣。于是，我几乎读完了官校图书馆所藏的这一类杂书，偶而以书中所得的材料写些掌故文章投寄各报副刊，亦居然有机会登出来。这就大大激发起我的写作兴趣，很希望多写文章，多赚稿费。事实上这岂又是容易之事呢。

在官校军文人员的同事中，同乡好友许晏骝兄是我的写作同好。他的天分极高，涉猎既广，成就亦大。他后来以“高阳”的笔名，写了数以百部计的历史小说及文史考证等书，在台湾文坛上得享大名。与他常相切磋研究，无形中更得到他的很多鼓励及

影响。1958 年前后，军中文职人员愿意继续服务的人可以在完成补充教育后改叙为军官，不愿改叙者则可以给资遣。我与高阳兄选择了资遣，另谋发展。高阳后来因写作历史小说成功而名盛一时，我亦因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之故而得渐窥学问之门径，在撰写掌故杂文方面薄有所成。回首前尘，当年的军文改制一事，对我与高阳兄的以后命运转变，可说都是一次极重要的契机。

（二）

我为什么决定离开军职而改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这也可是由文字写作的因缘而来。

在空军任职时，高阳兄常在香港报刊应征小说奖，对香港文化界的动态颇有了解。一天，他拿来一份香港亚洲出版社的征稿启事，告诉我该社正计划编印少年丛书，稿酬优厚，其中的“名人传记”一项，我一定可以胜任，不妨一试。我一看单上所开的稿费数目是每千字港币 20 元，大为心动。因为当时台湾的报刊稿费只有每千字台币 30 元，港币 20 元至少值到台币 120 元，是台湾稿费的四倍，而我们当时的月薪，也不过 300 多元而已。面对如此丰厚的稿费数目，我当然无法抵挡其诱惑性。经过一番计议之后，我认为我可以用戚继光的平倭故事为主要题材，写一本《戚继光传》去应征。

官校图书馆藏有戚继光所撰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神州国光社当年编印过一套《中国内乱外患史丛书》，其中在一本名为《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的书中，收有当时倭寇乱华的野史多种，再加上《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我认为，撰写《戚继光传》应该没有困难。但在一番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已面临了一项主要的困难，很难加以克服。

要为戚继光作传记，首先必须编制戚继光的生平行事年表，尤

其需要知道戚继光当年的几次重大战役，其实际发生情形如何？如以现有的材料从事撰写，写成的东西必定无法避免“小脚放大”的不伦不类之感。为了达到内容充实、叙事完整的要求标准，必须先能寻得戚继光年谱之类的书籍来参考。至此，我就不能不向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涛先生寻求支援了。

李光涛先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资深研究人员，在明清史的研究领域中成就卓著，经他的介绍，我读到了名为《戚少保年谱耑编》的戚继光年谱，并详细抄录了所需要的资料。我在两个月后写成了 7 万多字的《戚继光传》，寄到出版社，不久就获得港币 1200 元的稿酬，足足抵得我两年多的薪水收入。此书于 1958 年在香港出版，亚洲出版社的编辑在书首缀有一小段介绍文字，推许此书“是一部最好的戚继光传记”。我对这段话的含义十分明了。因为在我撰写此书之前，流传在坊间的同类书至少已有三四种之多了。看别人所写的同类书籍，不但对戚继光如何战胜倭寇的鸳鸯阵法全无交代，对于戚继光如何打败倭寇的各次重大战役，也全无实际情况的描述。通读全书，空泛的内容丝毫不能引起阅读者的兴趣，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称为是成功的。以我的《戚继光传》与之相比，风貌截然不同。所以然之故，则是因为我在详细研究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之后，对戚继光所创制的鸳鸯阵法已有详尽的了解，深知其所以能克制倭寇的原因何在，再加上年谱资料中的完整内容，自然能使这部书达到叙事完整而内容充实的地步。由此，进一步使我体认到一项事实——客观环境对于学术研究工作的成败，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我后来之所以终于会到史语所来做一名小学徒，这种想法无疑是最大的原动力。

1959 年 10 月间，我来到史语所当学徒。当时所得到的名义，是史语所的一名“临时书记”月薪台币 600 元。这点月薪还不够交付房租之用。好在我此时自觉已置身于一座蕴藏着丰富金矿的

宝山上，只要努力挖掘，不愁没有收获，所以也并不太担心此后的生活问题。

（三）

经高阳兄的推荐，我于 1960 年接受中华日报副刊的邀约，在该刊撰写《台湾今古谈》的连载稿。我对台湾历史本无研究，只好充分利用台湾文献丛刊及台湾研究丛刊两套资料丛书，再加上史语所还有台湾各县市所编印的地方文献及其他有关资料，使我在写作《台湾今古谈》时没有材料不足的困难问题。两年之间，我陆续写成了 15 万字左右的文稿，反应良好。以掌故文字方式写成的《台湾今古谈》，一方面注重阅读趣味，一方面适时介绍有关台湾历史、地理、民俗、物产等各种知识，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本提纲挈领式的台湾史。作为通俗性的读物来说，此书可以帮助读者对三百年来的台湾历史得到具体的了解与认识，亦可算是学术知识通俗化的一项尝试。台湾商务印书馆后来将此书出版单行本，迄今为止，其发行数量已逾 1.5 万册。这又似乎说明，我的此一写作尝试是颇能为多数读者接受的。

（四）

我在进入史语所不久之后，就能充分利用学习环境之便利而写成《台湾今古谈》，可以证明我之决定进入史语所作小学徒，对我的写作生活绝对有利。但我在史语所的学习与写作虽称顺利，而在职位上所遭遇的困难却很难克服，而且经历的时间也很长久。

我在进入史语所后的最大愿望，就是期盼成为编制内的正式人员，以便能享受实物配给及眷属宿舍等福利。然而，我这个“临时书记”的头衔居然一戴就是十年。直到 1969 年，因为图书

馆增加了一个职员名额，方才将我正式纳入编制。由学徒到“出师”要等到十年之久，如此长时间的等待，在生活上所遭遇的困苦，实难想象。唯一能使我艰苦支撑下去的，是我还能用我的笔来赚取稿费贴补生活，如其不然，我还能在业已结婚而有子女的情况下支撑到这么长久吗？

像史语所这样最高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对有志研究历史学的人来说，应该是最理想的所在。即使是像我这样不学无术之人，只要稍事探索，便知道这里的藏书正像蕴藏无限宝藏的矿山一样，永远挖掘不尽。要利用这里的藏书来写作掌故杂文，其中的材料俯拾即是，取携不尽。最具体的证据自然是我写作《台湾今古谈》之时，其中的材料全由馆中的藏书而来。写完了《台湾今古谈》再写其他的掌故文字，当然也是一样，材料绝无匮乏之虞，所需要的只是我辛勤挖掘的努力而已。

在较早些时，影剧界经常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拍摄历史古装剧的影片或电视，如西施、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杨乃武与小白菜、包公案、龙门客栈等。这些以搬演历史故事为主的影片或电视剧，内容常常错误，某些不甚为观众所了解的情节更使人难以理解，不知道当时何以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就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机赶写几篇文章应应景，自然也不愁没有刊登的机会。

以李翰祥所执导的大部头电影《西施》为例，观众不懂得什么叫“诸侯会盟”及“执牛耳”的盟主地位，我就写了一篇《黄池大会》加以解释一番。对于剧中服饰上的错误，我写了篇《裤子考》。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黄梅调新片正风靡全台时，我也先后写了《梁祝故事的演变》与《谈梁祝，谈称谓》等文章。当《包青天》的连续剧在电视台播映得如火如荼时，我也适时推出我对包龙图故事的研究成果：《包龙图故事的演变》。诸如此类的文章，由于应时而且富于趣味，不但易为读者所接受，也能顺便发

生一些教育作用。我写作这类文章，自认为得心应手，顺利之至，也十拿九稳，准确之至。这是我“卑之无甚高论”的投稿经验之一种。

写些应时应景的文章，本来谈不上称为掌故，只因我的写作材料十分丰富之故，在写作之时，我常常引用极多的材料来对某些问题作最深入的探讨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常常是既新鲜而有趣，写成的文章，便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颇与一般的应景文章有所不同。谈掌故而能同时得到有关问题的最正确的知识，这是我所习惯的写作方式。我以为只有用这种写法，才能使读者在感到兴味之外，同时建立起对此一问题的正确认识。这不正是历史学家所希望达到的教育目标吗？身为历史学的工作者，能够藉写作掌故文字的机会达到历史教育之目的，我认为应是最合适的写作方式。由于我所写的掌故文字大多具备此一特色，人们在习惯之余，渐渐地好象也颇能接受我的这种写作方式了。

我的掌故杂文既能为读者所接受，就逐渐有编辑先生向我约稿，或者在某事发生时要我特写一稿，或者在副刊上辟一专栏，长期登载我的文章。历数我写稿以来所曾撰写的专栏，除《台湾今古谈》之外，先后有大华晚报的《南窗随笔》及《双野史亭杂记》，工商时报的《玉堂蟬语》，青年日报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及《文坛谈往录》，文坛杂志的《中国皇帝之最》，畅流杂志的《中国古代名女人》等。这些文章后来有大部分再印成单行本。林林总总，数目居然不少。这些文章的内容当然并不很高明，但以一个出身史语所小学徒的人来说，为学识能力所限，只能到此地步，亦实在是十分无奈的事。

（五）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总以为所谓“掌故”也者，无非是根据